

45319

牡丹江文史资料

第一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牡丹江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编辑说明

敬爱的周总理生前亲自倡导的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惠及后世的光荣事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研究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革命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都具有现实意义。为推动我市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政协牡丹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决定出版内部发行的《牡丹江文史资料》。

政协牡丹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自一九八一年末成立以来，就积极地通过各种形式着手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现选录一部分，作为《牡丹江文史资料》第一辑与读者见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又缺乏对这项工作的经验，加之作者本人受个人经历、水平所限，难免有许多缺点、错误。敬请读者、知情者、文史爱好者予以批评指正，并热切希望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

目 录

敌营十年.....	王世江 (1)
抗日岁月的回忆片断.....	李范五 (36)
我参加革命的回忆.....	孙万贵 (41)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军国主义 对牡丹江的侵略.....	宋树清 (55)
一九〇〇年巴河义和团的 抗俄斗争.....	<u>孙永德</u> 宋树清 (63)
回忆三过草地.....	庞济轻口述 向阳整理 (73)
牡丹江市郊的古代文化遗址.....	樊万象 (85)
“九·一八”事变目睹记.....	张金祥 (92)
附录：征稿启事.....	(95)

敌 营 十 年

王 世 江

寻求光明 秘密入党

一九三三年，西北军在喜峰口英勇抗战，用大刀片杀敌的消息，威震全国，也点燃了我们青年人心中的抗日火焰，都想参加这样的队伍，抗日救国，誓死不当亡国奴。一九三六年春天，西北军冯玉祥旧部宋哲元回老家山东省乐陵县招考学兵。我在家读过两年私塾和三年小学，就同本县一百多名青年报名应招了。从此，就在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〇旅当了兵，实现了参军抗日的夙愿。

参加了抗日的二十九军，我觉得有了用武之地，练好武艺打日本的劲头更足了。不到半年时间，就把西北军练兵的“三大套”（劈刀、打拳、上单杠）学会了，考核成绩优秀，不久被提升为班长。

西北军虽然抗战闻名全国，但毕竟是旧军队，愚兵政策和打骂制度相当严重。新兵入伍第一堂课，讲的是纪律。连长就这样讲：“军队嘛，要绝对服从，比如，我手里拿一个鸡蛋，它本来是白色椭圆形的，官长偏说它是黑色方形的，你们也要随着说它是黑色方形的。这就叫做绝对服从。”当时听他这样讲，心里很不服气。但没人敢争辩，怕的是得不到实事求是的回答，反而招来皮肉受苦。长官随便打骂士兵，就连班长也随便打骂士兵。在新兵训练时，没有一个士兵能

幸免于打骂圈子以外，轻的“照半身相”（跪在地上），重的“吃锅贴”（用手打脖子）和“按两头打中间”（四个人按着四肢，用扁担或竹片打屁股），官兵关系比较紧张。

一九三七年六月底，二十九军为了宣传抗战，举办大、中院校夏令营，高中二年以上的学生参加集训，由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负责，抽调一批干部和班长去任教，我被调去当班长。

西北军是一支抗日爱国的军队，但却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克扣二十九军的军饷，逼得宋哲元自己印发钞票，维持所属部队的生存。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向北平西南郊芦沟桥中国驻军蓄意挑衅，制造事端。当时华北军民立即奋起抗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它记载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中国军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壮举。当时，守卫芦沟桥的驻军是国民党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〇旅。日军包围了宛平城，次日凌晨，何基沣怒不可遏，亲临前线指挥所属二一九团第三营奋起还击，英勇杀敌，打响了八年抗战的第一枪。

事变第二天早上，何基沣旅长派我和手枪连另一名班长刘树森到二一九团三营督战，侦探日寇的情况。赶到二一九团三营时，正遇日寇向三营阵地冲击。日军几次冲锋都遇上了我们坚决有效的抵抗，阵地前横七竖八地摆满了日军的尸首。日军为了突击我军的阵地，把汽车围上钢板当“装甲车”，边打机枪边冲锋，步兵跟在“装甲车”后一窝蜂似地往上涌。营长金振中立即下令用穿甲弹射击敌“装甲车”，一阵阵排枪向敌人“装甲车”打去，子弹飞离枪口的声音和

命中敌“装甲车”的声音几乎连在一起，乒乒当当地在三营阵地上响成一片，把敌“装甲车”穿了许多窟窿，打得敌“装甲车”掉头就跑。跟在车后的敌步兵抱头鼠窜，狼狈不堪。“司号员，吹冲锋号！”营长金振中适时向部队下达了全线出击的命令。一阵冲锋，又打死打伤敌人好几十个，并击毙了日军指挥官松游少将，日军连许多尸首都顾不上拖走，就灰溜溜地逃窜了。

七月九日，惨败的日军又以飞机大炮猛攻宛平城。我二一九团指战员浴血抗战，不仅保住了宛平城，而且夺回了已被日军占去的龙王庙等地。日军连遭惨败，吓得日军指挥官田代中将在八宝山剖腹自杀。这时，日军不得不扯起白旗谈判，以待援兵。旅长何基沣毅然受命前往与日军谈判。他严词驳斥了日方要中国军队撤出宛平城的蛮横要求，并愤怒地指出：“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容外国人践踏！”日军代表恼羞成怒，拔刀直逼何基沣。何基沣毫无惧色，拔出手枪对峙。这样打打谈谈，在芦沟桥附近中日双方拉了十几天锯。十几天后，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开到芦沟桥，战场形势突然起了大变化。敌众我寡，日军便大规模地进攻驻在北平附近的二十九军。这时，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急需接济给养、弹药和增援。我们早就听说蒋介石派了嫡系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开到河北增援。芦沟桥的守军日夜盼望援军快到，可是一等不到，二等不来，孙连仲到了河北的涿县，距北平只有几十公里就按兵不动了。就在二十九军打得伤亡十分惨重的关键时刻，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不但不增援二十九军，反而掉头南逃，一直退到黄河南岸，说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要据守黄河天险。于是，

二十九军便成了单独在华北奋战的孤军，被迫在北平和日军进行了巷战。爱国军人、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将军就是在这次内无粮弹、外无援军的巷战中为国捐躯的，牺牲了几千名将士。宋哲元在日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不得不撤出北平。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我随何基沣转战撤退到河北省泊镇（现为泊头市）附近。这时一一〇旅改编为一七九师，何基沣任师长，我在该师手枪连当班长。这天午饭后敌机又来轰炸，当场抓住两个给敌机指示目标的汉奸。“怪不得这几天敌机跟着我们轰炸，原来有汉奸给敌人当‘眼睛’。”“这两个家伙该刚！”战士们怒不可遏，议论纷纷。何基沣师长走过来大声命令说：“王世江！”“到！”

“你把这两个汉奸带到泊镇车站，杀头示众。”“是！”这时敌人已离泊镇不远，我带几个弟兄把这两个汉奸押到车站处决后，便急忙赶回师部，听见师部附近枪声不断，有情况了。几百个日军武装便衣队从我侧翼潜入，突然包围了我们师部。手枪连连长张跃甫率领全连迎击敌人，掩护师长何基沣突围，与敌激战两个多小时，连长张跃甫和排长李连璧阵亡，全连伤亡过半，我也负了重伤，一梭子机枪子弹几乎打断了我的左大臂，臂上的肉被打掉了一大块。

突出重围后，我们会合了部队向南撤退。蒋介石竟下令二十六路军把守所有的黄河渡口，不让二十九军官兵过黄河，妄图借日本人的屠刀把抗战的二十九军官兵斩尽杀绝，其手段之毒前所未有。我是个伤兵，运到黄河南岸总该行吧？他们竟连伤兵也不许过黄河去治疗。蒋介石排斥异己的卑劣做法，在二十九军将士中引起极大愤恨。正在对蒋介石

骂声不绝于耳之际，蒋介石派特务乘坐铁甲车，打着冯玉祥的名义，说是到前方督战，在连锁车站停着。我和被打瞎左眼的一班班长杨世亨被连里士兵强行抬上铁甲车。特务们怕发生兵变，对他们不客气，这才不得不把我们几个重伤员带到济南去。

我和杨世亨在济南车站下了铁甲车。济南本是个美丽的城市，这时也简直成了人间地狱。到处是河北逃来的难民，他们无依无靠行乞度日。伤兵杂在难民中根本无人过问，而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只顾自己逃命要紧，还有谁来管我们几个叫花子似的伤兵！我们托了人情，苦苦哀求，才在济南市协和医院挂上了号。一个医生一打开我臂上的裹腿带，臭气四溢，伤口里的烂肉脓血中已生蛆，蛆虫四处乱爬。医生掩着鼻子皱着眉，十分武断地说：“必须把臂锯掉！”抗日的战士怎能没有臂？不得已，含恨离开了济南。不久，济南也被日寇占领了。离开济南后，打听到兖州有个国民党第三重伤医院。杨世亨架着我上火车到了兖州，住进了国民党第三重伤医院。在医院里，看到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病号住在整齐、干净的房间里，我们这些从抗战前线下来的重伤号却挤睡在铺着麦草的地铺上，心里很是不平。一个抗战军人为国家流血牺牲本是份内之事，只要能治好伤，睡草铺也可以。但同样是军人，待遇却如此不平等，嫡系部队的病号每天吃大米白面，供应我们“杂牌军”伤员的却连粗粮也不管饱；嫡系部队病号要什么药有什么药，我们这些从前线回来的伤员每天只能用消毒水和盐水洗伤口。最令人难忘的是这年的“双十节”，蒋介石的第三重伤医院“慰问”伤病员时，给嫡系部队的病号每人发十元钱，给“杂牌军队”的伤员每人发五元

钱。我入院两天后才来个医生查房，这个医生看了我的伤口，用手捂着鼻子说：“你的伤口已经恶化，另外伤口太大也无法愈合，看来你这个左臂非锯掉不可。”“我还要重返前线抗战，怎么能把我的臂锯掉呢？”“你的想法很好，可是舍不得一只臂，恐怕性命难保。”我生气地说：“保不住性命我也决不锯臂！”他最后说：“那你再想一想吧。”这个医生不但没治疗我的伤，反而给我增加了思想负担，使我几天几夜没睡好觉，伤口恶化也越来越重，蛆蚜满身爬，露出的骨头都变黑了。正在我苦恼的时候，一位有爱国心的年轻军医十分同情我，来给我换药，治疗。一次他给我换药时说：

“你咬咬牙忍着疼，我用小刀把你骨头上的灰尘刮掉，慢慢就会愈合。”听他一讲，我又喜又怕。心想，关公一边刮骨疗毒，一边下棋，谈笑风生，难道一个抗日的战士死都不怕，还怕刮骨？我随手把手帕放在嘴里咬住说：“只要能治好伤，你就动刀吧，大胆地刮吧！”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刮骨，真是钻心地疼。他一边一刀一刀地给我刮骨疗毒，一边不时地看着我的脸色，并用药布擦掉我头上的汗珠，说：

“多忍一会吧，刮干净些会好得快些。”就这样一刀一刀，把我伤口里的脓血烂肉和骨头外层变黑的骨头都彻底地刮了一遍。刮后不到十天，果真看到有新生的肉牙，后来慢慢长出了新肉，伤口一天天逐步愈合。

由于“杂牌军”在医院受到排斥，激怒了伤员，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伤员联合起来，砸了医院，打了院长之后，凡能行动的伤兵大部分都离开了医院。我因为参加了这次活动，虽然伤未痊愈，也实难继续住院治疗，便随之自动出院归队。

就在我受伤的时候，蒋介石命令孙连仲部的二十六路军

把守着黄河渡口，不让宋哲元部南撤。宋哲元被迫沿黄河西溯，退至山西。到山西后，又倍受阎锡山的排挤。这位在喜峰口、芦沟桥、北平抗击日寇侵略的爱国将领，终于被蒋介石逼得精神失常了，最后，客死成都。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在泊镇突围后，率部撤到大名府，日军的追击部队随后又包围了大名府，何基沣率部与日军在大名府大战一场，伤亡殆尽。何基沣等援军无望，抗日前途渺茫，又不甘心做亡国奴，怀着对蒋介石排斥异己，假手日本人屠杀“杂牌军”，拱手让出华北大好河山的无限悲愤，开枪自杀，打伤了左肺，被送进了医院抢救。

正当二十九军官兵眼见大好河山一块块地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置于无可奈何之时，中国人民的伟大救星毛泽东主席派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八路军以不足三万人的兵力在敌后建立了广大的游击根据地，并在平型关一战，痛歼了日军精锐部队坂垣师团一部，全国民心大振。我们看到了抗日有前途，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才能救中国。由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游击战争，钳制了绝大多数的日军，迫使日军攻下武汉之后，进攻的矛头再也不能前进了。

这情景也鼓舞了何基沣，看到了只有共产党才真抗日。他便利用养伤住院之机，由湖北取道西安，到了延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亲切接见了，对他在芦沟桥抗战中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何基沣要求留在八路军里，毛主席劝他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维护第二次国共合作，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劝他继续留在西北军里带领部队抗战。后来何基沣又回到一七九师。我党接受了

何基沣的请求，随即派地下工作者来到何基沣部队做工作。我出院回到部队，眼见部队减员严重，蒋介石又不给补充，相形之下见真伪，深切地感到，只有跟共产党走，参加八路军，才是光明的前途，因而广大青年都纷纷奔向延安。在这样形势下，我和李明远联络了高玉甫、赵明辰、刘煜臣等部分青年，准备投奔延安。大家商议要携械去延安，反正带枪走也不是去当强盗。正气出胆量，大家都秘密地设法搞枪支、弹药。正在这时，我党地下工委书记邱晓亭（现名邱静山）分别找我们谈了话，这真是干柴遇烈火。他说：“你们要到延安去，这是正义举动，象你们这样的爱国青年，全国到处皆是，已经到延安的何止千万，如能明确到延安是为了抗日，那么，只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组织起来在旧部队工作，起的作用会更大。因为你们在这个部队人事都熟悉，去延安学习后不一定回原部队工作，岂不是舍近求远吗？另外，延安那个地方并不大，去的人过多，确实容纳不下，希望你们慎重考虑。”我们听了邱晓亭讲的有道理，想离开也不是为了这个部队本身，而是因为蒋介石不抗战，而且排斥异己，内心不平，才产生去延安这一念头的。如能在这里得到共产党的领导，暂不去延安并非不可。此后，邱晓亭经常找我谈话，在他的培养教育下，于一九三八年秋，他介绍我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根据党的要求，地下工委派我去给何基沣师长当通信员，担任党与何基沣的联络工作。

何基沣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到延安住了一个多月，亲眼看到了共产党坚决抗战的情景，特别是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亲切接见了，使他进一步明确了国共两党有本质上

的区别，这就是：国民党投降卖国；共产党坚决抗战。所以，他从延安回到部队后，思想又和党靠近了一步。曾多次拿出武器和金钱帮助我党。一九三九年一月，何基沣被党中央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

一九三九年秋，邱晓亭同志调到新四军五师工作，由王西萍同志担任地下工委书记，接替了一七九师的地下工作。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培养骨干、发展党的组织，在王西萍同志的领导下，一九三九年秋，在该师成立了一个搜索队，这个队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周宝文任队长，我担任军事教员，王西萍同志公开身份是师部副官，常驻搜索队主持工作。这个队开始有六十多人，后来发展到一百多人，它的任务是对外搜索敌情，到敌后打游击，对内是为该师培养初级干部，并做我党活动的联络站。何基沣师长对搜索队很重视，用新式武器装备了这个队，训练器材和弹药都优先供应，编制和训练计划都自行拟定。对外活动不受限制。

定 计 除 奸

一天晚间，搜索队从敌后打游击回来，王西萍把几个干部找来说：“我们队里发现有坏人，是混进我们内部的败类。有两个为首，企图先把我们几个干掉，然后强迫把队伍拉走，去投敌叛变。他们今晚可能就要动手。在这样一个你死我活的斗争面前，我们考虑一下该怎么办？”当即大家都表示：“匪徒要干掉我们去投敌，这是十足的汉奸，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就要被他们干掉！”

“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我们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他无我，有我无他，不能坐以待毙！”工委书记王西

萍同志同意大家的意见，他说：“这件事非同小可，要慎重行事，决不能放走坏人，也不能冤屈好人。首先要把他们犯罪证据拿到手，对为首的决不能手软，胁从者坦白无罪。”队长周宝文说：“他不是要干掉我们吗？我先给他送上门去试探一下，根据他的行动，我们再动手也不迟。”周队长拿过一支手枪卸掉撞针，挂在墙上说：“叫他拿上这支手枪和我一同到阵地上去一趟，差不多就能得出结论。”王西萍说：“你这办法很好，现在就照你说的去办吧！”周队长出去不多时叫来了在今夜要叛变的一班长李×，急忙令他把墙上挂的手枪带上，对他说：“听说前边有情况，你跟我到阵地上去看看。”说着，随手又拿出一梭子手枪子弹交给他：

“快把子弹顶上膛，跟我来。”他一看周队长把手枪递给他，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到手了，立即把子弹推上膛，然后笑嘻嘻地跟周队长走了。离开村子向西北走，周队长在前边回头说：“今晚真黑呀！你要注意敌情，可别碰上敌人把咱俩给俘虏去。”他说：“周队长，你放心，这一带的地形我熟得很，前边不远，就是天黑前咱们看好的阵地。”周队长说：“你在前边走，咱们到阵地上去看看。”他紧走了两步，走到周队长的前边。他心里有鬼，回过头来问道：

“今天下午宿营前你不是说这附近没有敌情吗？”周队长说：“敌情瞬息万变，警惕性高一点好。”这家伙知道周队长枪法好，便提前动手，企图先干掉周队长，回去再立即按他们的计划行动。走着走着，这家伙便举枪对周队长头部扣了扳机。枪未打响，他疑为是个瞎火，连忙拉开枪机又把第二颗子弹送上膛，又扣扳机，枪又没有打响。这家伙觉得有问题，拔腿就想跑。这时周队长的手枪打响了，这个家伙的

脑袋随着枪声便开了花。周队长从地上把那支没有撞针的手枪拣起来，又在他身上搜出伪造的证件。回来一看，与王西萍说的情况完全相符。王西萍说：“他的尸体得掩埋起来。”随即叫我和李明远拿着铁锹去埋他。我和李明远按周队长说的地方找到尸体，把他胸前的符号取下，就地埋掉了。

王西萍说：“为了教育大多数人，我们还要让反革命分子暴露。”随后又召集了班长以上的人开会，王西萍说：“我们队里出现了反革命叛徒，他们有可能在今夜叛变投敌，你们大家回去要做好准备，随时应付发生的事情。”另一个反革命分子徐××一听，脸色马上就变了，宣布散会后，他就慌了神，第一个站起来走了出去。周队长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他，并紧紧跟在他的后边。他明知跑不掉了，便又回到班里假装睡觉。这时周队长在外边作了部署。这个反革命分子那里能睡得着觉，不一会就爬起来想溜，一出门就跑，当即被部署好的人抓住，问他干什么去，这家伙不回话，仍想拒捕争脱。周队长一个箭步冲上去，用手枪对准他的脑袋说，“不准反抗，不然，我就开枪！”他这才老实地就捕。王西萍立即传令全体集合，当场宣布了他的罪状，读了他们伪造的证件。这时全队官兵强烈要求立即将该犯处决。主持大会的王西萍同志根据他们反革命的罪状，宣布对该犯处以极刑立即执行。这时马上过来两个战士把他拉出村外，带到一个小水池子边，由我用木棒将该犯处死。就这样，在一夜间平息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叛乱。

扩 大 地 下 组 织

搜索队成立半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何基沔在延安向党提出帮助他改造旧军队的初步成效。根据形势需要，在搜索队的基础上，再扩编一个学兵队。王西萍向何基沔建议叫我任学兵队队长。经何基沔同意，于一九三九年年底成立了学兵队。全队一百一十人，班、排长是从师里选的思想进步、有培养价值的青年人。学期为一年，目的是为改造旧军队培养骨干，同时作为地下工作联络点。在建队前，王西萍对我说：“一定要废除打骂，经济要民主，帐目要公开，由士兵委员会管理经济，认真改善生活，保证士兵吃饱吃好，官兵要一律平等，但纪律一定要严明。”他最后说：“只要能坚持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开小差，我们的工作就能顺利开展。”果然不错，经过短短两个月的训练，就取得了良好的训练成绩，士气旺盛，情绪高涨，师参谋长徐云繁还在一次会上，要求全师其他连队以学兵队为榜样进行训练。

王西萍根据需要，分别住在搜、学两队。他接近士兵，经常亲自教唱抗战歌曲。在繁忙中他从不间断看书学习。为使他工作和学习方便，我为他单独找了个小房间。他习惯在夜间看书，每晚都在十二点以后才熄灯，早晨起来，他的鼻孔总是黑的，因为湖北农村点灯用木籽油，烟气很大，所以熏得鼻孔发黑。王西萍对个人要求很严，生活艰苦朴素，总是随士兵灶吃饭。我见他天天睡得很晚，就给他炒了点油茶面放在他屋子里，但他从来不一个人食用，遇有来往的同志才和大家一起吃。长年累月洗不上澡，又不能经常换衬衣，大家围坐火盆烤火时，经常在身上摸出虱子来，放在火里烘烘

乱响。有时我在拉胡琴娱乐，他开口便唱——“我本是卧龙岗……”等京戏。除在政治上我受到他很大帮助，在日常生活的言行上，也在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学兵队较前也有明显的进步。我们学兵队选了一个进步青年，名叫周庆歧。我们决定让他担任司务长。那时我们在湖北省远安县打游击，生活十分艰苦。一天晚上八点来钟，我们到了香油瓶山口里回马坡附近的山村宿营，老百姓听说来了队伍，晚上弄不清是日本鬼子还是中国军队，村中的人都吓跑进山了。周司务长看老百姓猪圈里有猪，就跑来找我：“部队连续打仗、行军，已几天没有吃上菜了，这里老百姓有猪，是不是杀两头改善一下伙食？”“老百姓不在，无法付钱，不能随便杀。”“我去找。”“那好吧，找到后再杀。”周庆歧上山喊：“老乡们，我们是国军，别害怕，我们买卖公平，你们回来吧……”他这样一招呼，大多数老百姓都回来了。买了两头猪杀了。因司务长是回族，他偷偷地又杀了一头牛。我说：“杀猪可以，杀牛不行。”“我已叫人杀了，咱不杀，日本兵来了也是抢去杀。”我生气地说：“你去找老百姓赔礼道歉，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以挽回影响。”随后我又去赔礼道歉，加倍还了牛钱。

当晚我向王西萍作了汇报，他说：“这样搞，脱离群众。”那时在国民党部队里，象这样随便杀老百姓牛的比较普遍。他当即向我说：“要当个典型抓，以教育大家。”第二天，我召集全队开会，对周司务长进行了公开点名批评。这样抓了以后，象这类事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

我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当部队宿营时都要到各班去看看。一天宿营时我来到七班，见班长冯志忠发高烧不省人

事，我急忙让卫生员给他打针。卫生员说：“全队就这一支盘尼西林了（青霉素），是给你留着的，打了就没了。”“我是人，战士也是人，谁有病谁用，还是救人要紧。”结果用这一支药，把他救过来了。

一九八〇年三月，我去北京参加何基沣追悼会时，见到了冯志忠，他拉着我的手说：“老队长，那年在香油瓶山沟里发高烧时，要不是你给我打上那一支救命针，我早就不在人世了，哪还有今天！”战友相逢，分外高兴，共叙友情，终身难忘。

叛徒告密 组织撤离

在抗战期间，我党经济十分困难，何基沣主动向王西萍提出，他拿出一批钱交给党使用。有一次，他扣压了全师的部分薪饷，拿出一万元交给我党。是由刘放同志（原六机部副部长）和项迺光带走的。刘放带六千元，项迺光带四千元。他俩走到湖北老河口住在旅店里，项迺光说他有事要到外边去一趟，但项迺光出去了一天，直到晚间未回来。刘放同志觉得项迺光可能出了问题，为警惕事有变故，他当即作了住所转移。事后得知，项迺光果然出了问题。那天他出去后，被敌五战区李宗仁的特务跟踪追捕了，项迺光从此当了可耻的叛徒。对此，我党称之为“项迺光叛变”事件。因为他叛变后出卖了组织，供出了地下党负责人的姓名，李宗仁便立即下了通缉令：“抓到共产党在鄂西北负责人王西萍，悬赏大洋一千元。”同时李宗仁还向蒋介石报告说何基沣有共党嫌疑。蒋介石即下令调何基沣到重庆受审。

项迺光叛变后，地下工委书记王西萍很快接到上级党组